

被遺忘的「鼠疫鬥士」陳祀邦醫生

北京扶輪社 1928-1929 年度社長

中華扶輪史研究員 劉敬恒

2014 年 10 月 10 日



1911 年大清國東三省發生鼠疫，陳祀邦醫生(Dr. Chen Sze-Pong, MMed (Cambridge), MBBS (Cambridge))為總醫官伍連德博士(Dr. Goh Lean-Tuck, M.D.)的助手。1912 年 1 月，中華民國建國。1913 年陳祀邦入北京籌建京師傳染病醫院，後任院長。1918 年山西發生鼠疫，陳祀邦為三名檢疫委員之一。1924 年陳祀邦受委任為北京中央醫院總醫官，同年參與組成北京扶輪社(Peking Rotary Club)，為創社社員之一。然後，在 1928-1929 年度任社長。1929 年 1 月，英文扶輪雜誌《The Rotarian》第 15 頁，簡單介紹了陳陳祀邦的職業。

陳祀邦，字新周，祖籍廣東省新寧縣（今臺山市），1884 年在馬來亞(Malaya)的吉隆坡(Kuala Lumpur)出生，是家中的第二個兒子。陳祀邦有三個兄弟，分別是祀強、祀仁和祀安。父親陳福源（Chen Fook-Nyan）年少時從家鄉移民南洋，先在婆羅洲(Borneo)的砂拉越(Sarawak)工作，後前往吉隆坡出任衛生署主任秘書、華人政務司調查員等職。父親 1909 年退休，1933 年在新加坡(Singapore)過世。陳祀邦先後在吉隆坡的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Institution)和新加坡的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就讀，1901 年成為英屬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第一個獎學金得主。他負笈英國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的岡維爾凱斯學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攻讀醫科，也曾在倫敦的聖托馬斯醫院(St. Thomas' Hospital)實習。1904 和 1907 年陳祀邦分別取得劍橋大學醫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之後他任倫敦藥房的高級醫官，月薪 40 英鎊。

陳祀邦於 1908 年回到新加坡行醫，有關他在新加坡時期的訊息不多。陳祀邦在新加坡的事業及家庭生活也少有資料提及，只有在他的父親 1933 年 11 月逝世時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提及，知道他已經娶了一名英國女子為妻。另外，比較引人注目的是他在 1911 年 5 月 20 日，以「海峽華人足球協會」籌備會主席的身份召集會議。會議上與會者通過章程，正式成立了這個足球協會。

協助伍連德抗疫

不久，陳祀邦離開新加坡，到了大清帝國，具體原因也不詳，但從他以後的活動事蹟來看，應該是受伍連德（1879-1960）的招募前往協助他的研究和防疫工作，因為1911年7月陳祀邦就隨同伍連德到大清帝國東北俄羅斯(Russia)邊界考察了。伍連德是1896年英女皇獎學金得主，也是前往劍橋大學完成他的醫科學位，1903年回到新加坡。所以伍連德是陳祀邦在劍橋大學的學長。

1908年前往大清帝國服務的伍連德，此時（1911年中）已經是名聲享譽中外的防疫和醫學專家。他領導的團隊，在1910年12月至1911年3月間，成功撲滅了大清帝國近代最嚴重的東北大瘟疫，因此有「鼠疫鬥士」之號。接著，在1911年4月間，成功召開第一次在大清帝國主辦的國際防疫醫學大會（又稱「萬國鼠疫研究會」），身為大會主席的伍連德，主導了這次為期28天的防疫醫學研討會，奠定他在國際醫學界的知名度。國際防疫醫學大會結束後，伍連德專注於防疫工作的田野調查和研究工作。

根據伍連德的自傳，他受俄國專家 Zabolotny 教授的邀請，從1911年7月21日開始展開為期70多天的田野考察活動，被伍連德徵召參加這次清俄聯合考察活動的兩位清方醫師，其中一位就是陳祀邦。他們田野調查的足跡從清俄邊界的滿洲里開始，進入俄國的 Borzja，蒙古的 Charbada，Kerloni 及黑龍江的支流等地考察。期間大部分日子都是露天或紮營在帳篷中做實驗和過夜的，條件非常簡陋。陳祀邦成為伍連德的得力助手，也因此取得伍連德的信任和賞識。

伍連德和陳祀邦等人在清、俄、蒙邊境鄉鎮考察活動結束的時候，伍連德曾在國際防疫醫學大會上建議設立北滿防疫處和附屬的防疫醫院的案子，也已得到大清帝國政府的批准。陳祀邦積極協助伍連德，籌辦位於哈爾濱的濱江防疫醫院的工作。1911年11月陳祀邦被委任為濱江醫院的正醫官，主持醫院的日常運作。

1912年(民國元年)9月底「北滿防疫事務管理處」(簡稱「北滿防疫處」)(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開始運作，伍連德受委任為北滿防疫處總醫官，兼任濱江醫院院長。北滿防疫處也從臨時的一個辦事處遷移至濱江醫院辦公，形成防疫行政和防疫醫院一體的管理體制。陳祀邦和一些醫師同時為北滿防疫處和濱江醫院服務。

陳祀邦深受伍連德器重，可以從北滿防疫處出版的第一本報告書的內容看出。這本涵蓋1911年至1913年業務的報告書長達200頁，共有23則報告和文章。其中有具名作者的報告和文章共11篇，包括擔任主編的伍連德所寫的三篇，另外兩位洋籍醫生各寫一篇。而陳祀邦則獨自寫了六篇，有介紹濱江醫院和報告其院務發展，也有他到各地區考察和調查的報告，可見他的工作相對充實。陳祀邦為伍連德主編的報告書賣力執筆撰文，也顯示他已成為伍連德的左右手。

山西抗疫再立新功

伍連德雖然倚重陳祀邦，但不會長期將他留在身邊。因為他重視人才的發展和出路，也因此擴展他的網路和影響力。1913年，伍連德推薦陳祀邦到北京籌建京師傳染病醫院（又稱北京隔離醫院），兩年後陳祀邦順利成為京師傳染病醫院的首任院長。

1918年山西等地發生瘟疫，疫情快速擴散。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徵召三位有經驗的專家前往處理。伍連德、陳祀邦和何守仁榜上有名，陳祀邦再次和伍連德合作抗疫。但此時陳祀邦已經不再只是伍連德的助手，而是與伍連德平起平坐，同為政府委任的檢疫委員。陳祀邦不遺餘力地查訪居民，設法早日控制疫情。到了次年（1919年）二月中，為了更有效的控制疫情，疫區被劃分為四個部分。陳祀邦被分配到的第三區，行政上是由大同鎮地方官秉承山西督軍省長辦理，而實際的檢疫工作由陳祀邦執行。由於中央和省府職權分配不明確並有利益的衝突，山西的抗疫活動困難重重。但陳祀邦堅守崗位，盡力完成任務。

事後，陳祀邦的表現受到北洋政府的賞識和表揚，1921年12月獲中華民國大總統授予二等大綬嘉禾勳章，1923年1月又獲授四等文虎勳章。

羽翼漸豐 出任北平醫師會會長

1924年陳祀邦受委任為北京中央醫院（現為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總醫官，這個任命也與伍連德有關，因為這家醫院與伍連德有密切的關係。伍連德在1915年倡議興建並親手草擬醫院設計圖，1916年醫院奠基，1917年建成，1918年1月27日正式開院接診，伍連德擔任首任院長。

陳祀邦也參加1915年成立的「中華醫學會」。這個學會是中國的第一個華人西醫團體。伍連德擔任中華醫學會籌備時期的執行秘書，並在1916年舉行的第一次大會上被選為會長，並連任兩屆，為期四年。陳祀邦在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大會上，發表了兩篇論文，題目分別是《醫學教育之商榷書》和《舊醫之弱點》。陳祀邦當時人在北京，沒有親自出席會議，論文是分別由唐乃安醫師和鍾拱辰醫師代為宣讀。而且，在大會結束前的中華醫學會職員幹部選舉中，陳祀邦還被選為「會員部」的幹事，成為伍連德重用的核心幹部，協助他推行會務。

有了辦學會的經驗後，陳祀邦於1922年10月發起成立「北平醫師會」，即今「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北京醫學會）」的前身，並擔任首任會長。他同時繼續活躍於當時會所設在上海的「中華醫學會」，並於1926年2月被推選為中華醫學會的副會長。此外，由於各種資歷完整，1928年7月陳祀邦一度受北平特別市委任為衛生局代理局長，暫代未到任的黃子芳局長的職務。至此，陳祀邦已經羽翼豐滿，在中國防疫醫學和醫學行政界樹立自己的威望，可以獨當一面。

代表中國出席英皇加冕典禮

1937年4月至5月間，陳祀邦隨同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赴英國倫敦(London)參加英皇喬治六世(King George VI)的加冕典禮。可見陳祀邦由於外語能力和對英國的熟悉，也受邀參加這個重要的外交活動。吊詭的是，36年前陳祀邦是以英國的子民及英皇獎學金受益者的身份來到英國學醫，而這次則是代表中國政府來倫敦向新登基的英皇祝賀。這也顯示出萊佛士書院栽培出來的傑出畢業生，不只是為新加坡或大英帝國服務和貢獻，也可能為世界其他國家服務和貢獻。

